

Wang Tuo's "Xiangtu" Genealogy:
Literary Debates, Activism, and Iowa

Yi-hung LIU

論戰、運動、愛荷華：
王拓「鄉土觀」的歷史考察

劉羿宏

劉羿宏，夏威夷大學（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oa）美國研究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博士後研究員。
聯絡方式：yhliu@hawaii.edu。

摘 要

本文以王拓為分析對象，強調王拓在鄉土文學論戰之中與之後的脈絡與移動軌跡，期能為現行的王拓研究以及廣義的臺灣研究提供新的材料。本文立基於王拓的傳記研究，但著重分析王拓1977年的文學評論、1979年的政治活動、1986年的美國行。藉由這三個節點，本文勾勒出王拓在1970年代後半至1980年代後半的際遇與網絡，試圖闡明王拓如何貢獻於鄉土文學論戰反帝、反資、民族主義的核心內容，同時也提供資源予隨著黨外運動形成的臺灣民族意識。本文指出，王拓在這個時期的成就，暗示了他在1990年代與昔日戰友的分裂，並解釋了他日後立場的矛盾，但這樣的矛盾，容或能讓我們重新思考「統」、「獨」等政治標籤的侷限。

關鍵詞：王拓、1977鄉土文學論戰、黨外運動、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

Abstract

Building on the scholarship on Wang Tuo's life and works, this essay examines Wang's involvement in literary debates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late 1970s, as well as his trip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86. By attending to the three nodal points in Wang's career, this essay intends to illuminate the significance of Wang's apparent inconsistency in his literary-political achievement. It hopes to not only complement current studies on Wang Tuo in relation to Taiwanese history, but also rethink the political labels that delimit our imagination about political futures.

Keywords: Wang Tuo, Nativist Literature Debate in 1977, Tangwai movement,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2016年8月，身兼小說家與政治家的王拓逝世。2019年12月，王拓的三本遺作陸續出版，包括紀錄作者投身政治與社會運動的紀實小說，《吶喊》與《呼喚》，以及生前未付梓的小說，《阿宏的童年》。其中，《吶喊》一書以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臺灣為背景，以化名的方式記錄王拓親身參與的文學與政治運動，以及同時代知識分子、政治人物的交流與交戰。正式出版前，「小英教育基金會」的合作媒體《想想》選摘並刊登〈黨外的聲音〉；¹《上報》節錄刊登其中的〈《夏潮》雜誌社〉；²《風傳媒》則選取刊登關於鄉土文學論戰的篇章。³這些選文不只意味著王拓文學實踐與政治之間的扣連以及他在臺灣戒嚴時期的重要性，同時顯示出王拓或統或獨的策略，更指出今日臺灣如何仍囿於自1990年代初期起壁壘分明的統獨政治中。

本文以王拓為分析對象，著重他在鄉土文學論戰內的位置以及論戰之後的移動軌跡，期能藉由新的材料，深化現行關於王拓的討論⁴及廣義的臺灣研究。王拓於1944年出生於臺灣基隆八斗子，1970年開始發表文學創作及評論，1976年出版小說《金水孀》，此作後被視為臺灣鄉土文學的經典代表。1977年4月，鄉土文學論戰在臺灣文化界展開，王拓的〈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有關「鄉土文學」的史的分析〉一文，咸被稱作論戰的「第一槍」。約莫同時，黨外運動蓬勃發展，王拓也投身其中。1979年12月，王拓因高雄事件（美麗島事件）被捕入獄，1984年假釋出獄。兩年後，王拓應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簡稱IWP）之邀，以作家身分赴美，此期間也以「政治犯」身分

-
- 1 王拓。2019年12月12日。〈王拓《吶喊》選摘：黨外的聲音〉。《想想》。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8009> on Jan 20, 2020.
 - 2 王拓。2019年12月15日。〈王拓：《夏潮》雜誌社〉。《上報》。Retrieved from: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77237 on Jan 20, 2020.
 - 3 王拓。2019年12月13日。〈王拓遺作：鄉土文學論戰——沒有人性哪來文學？〉。《風傳媒》。Retrieved from: <https://www.storm.mg/article/2041975> on Jan 20, 2020.
 - 4 如李進益編（2017）《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100：王拓》，與謝世宗（2019）《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內的王拓一章。

至美國各大學演講。1987年國民黨政府宣布解嚴，王拓於同年接受陳映真邀請，擔任《人間》雜誌出版社社長，整頓社務，後任夏潮聯誼會第一任會長並參與工黨創黨，但隨即在1989年離開並加入民主進步黨。1990年代至2000年代，王拓活躍於政壇，2008年更接受蔡英文任命為民進黨秘書長。

本文特別凸出王拓1977年的文學評論、1979年的政治活動、1986年的美國行。透過這三個節點，勾勒出1970年代後半至1980年代後半期間王拓的際遇與網絡，藉此梳理鄉土文學論戰的歷史脈絡，同時說明全球冷戰內的國際情勢（尤其是美中臺關係之轉變）如何牽連著臺灣的民主化進程，定調且確立「中國」與「臺灣」的分野。身處國際與島內的政治動盪中，王拓不只貢獻於鄉土文學論戰「反帝、反資、民族主義」的論述，也為隨著黨外運動發展的臺灣民族意識提供一定資源，而他在美國所留下的紀錄，解釋了當時他對「臺灣」與「中國」的認識。本文試著闡明，王拓從1970年代至解嚴前夕的文學與政治實踐，已暗示了他日後與鄉土文學論戰戰友的分裂，王拓的身後之作更進一步確認他如何策略性地選擇政治立場。本文在分析王拓的鄉土觀之餘，希望能照見當時代知識分子間的糾纏與複雜，以及各個政治標籤的可應用性與相應而來的侷限。

一、從文學論戰到黨外運動：「要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要爭取國際的生存權」

王拓積極參與的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並非突發事件，而是知識分子與青年學子目睹蔣政權的失敗後「回歸現實」的實踐之一。⁵早在1970年8月，釣魚臺爭議即清晰暴露出中華民國政府在主權與領土問題上受制於美國與日本，隔年7月，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將於次年訪問北京，聯合國更在同年10月25日通過第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聯合國的一切權利。這些事件在在暗示著冷戰局勢內的中美關係將發生巨變。1972年2

5 關於1970年代臺灣的文化、文學生產如何扣連著政治現實，蕭阿勤的研究最是詳實嚴謹，見蕭阿勤（2010）《回歸現實》。

月，尼克森正式訪問北京並發布《上海公報》，確認兩國外交關係正常化的走向，9月，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發布聯合聲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1975年4月，中華民國的領導強人蔣介石去世，同年12月，美國總統福特訪問北京。處在內憂外患中的國民黨政府地位益發不穩。1978年12月，美國宣布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同時與中華民國斷交。在這樣的政治困境中，文化生產也隨之變化，1972年至1974年發生現代詩論戰，針對臺灣詩作的西方美學標準與迴避臺灣現實的傾向，論辯雙方展開攻防，1975年8月，第一本以「臺灣」為名的雜誌《臺灣政論》發行，顯示出「著眼現實」雖未成主流，但已具備一定的號召力，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正是生發在此一脈絡、回應當時社會現實的事件。

《仙人掌》雜誌是促使鄉土文學論戰發生的重要媒介。作為冷戰時期臺灣文化出版界要角，「仙人掌」見證了文壇地景的轉變。仙人掌出版社創辦人與雜誌發行人是印尼華僑林秉欽，1935年在印尼出生，臺大土木工程畢業後任文星書店門市經理；文星結束營業後，林秉欽於1968年創辦「仙人掌出版社」。選書出版的同時，也代為發行當時三大文學刊物：《現代文學》、《文學季刊》、《創世紀詩刊》。1973年，仙人掌出版社停業。⁶1977年，「仙人掌出版社」轉以《仙人掌》雜誌再度現身臺灣文化界，每一期的封面素描皆出自吳耀忠，創刊號（1977年3月1日）以「不溺富貴，不畏權勢的傅斯年」為封面，發刊詞題為〈中國的出發〉，期許能夠「逐步進行科學、知識、文學、思想、生活、藝術的中國化」。《仙人掌》第2期以「近代中國的啓蒙者梁啓超」為封面，這也是開啓鄉土文學論戰的「鄉土與現實」專號。此期收錄關於「鄉土文化」的評論文章共11篇，包括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尉天驄〈什

6 根據傅月庵，當時林秉欽身為華僑卻久未回印尼且未服役，因此被送至二膽島，仙人掌出版社暫告一段落；然而根據李敖，林秉欽是因吳大猷控其「冒名出書」而入獄服刑兩個半月，出版社告終，林秉欽1973年8月22日才出獄。見傅月庵（2003: 165-168）；李敖。〈日期不詳〉。《給外省人難看》。Retrieved from: <https://github.com/whatot/leeao/blob/master/13.國民黨史政類/給外省人難看.md> on Aug 20, 2019.

麼人唱什麼歌〉、銀正雄〈墳地裡哪來的鐘聲？〉、朱西甯〈回歸何處？如何回歸？〉等。當時主編王健壯（2009）日後回顧：「這是鄉土文學正反兩派，首度在同一個媒體上交鋒打擂臺。」

儘管王拓一文往往被稱作開啓論戰的第一槍，但與其說反對鄉土文學的作家是被動回擊，不如說他們針對鄉土派作家主動出擊。⁷以銀正雄與朱西甯為例：兩人的文章都針對「鄉土」一詞提出疑義，也質問「回歸」的路徑與方向。銀正雄提問：「問題是『回歸』什麼樣的『鄉土』？廣義的『鄉土』民族觀抑或偏狹的『鄉土』地域觀？」（尉天驄1978: 203）；朱西甯則帶著鮮明的中國民族反共主義色彩，主張「回歸民族文化」的前提是「認知中國文化源頭的宇宙基本法則，及由其生發為中國現代化唯一路徑的三民主義」（*ibid.*: 226）。銀正雄與朱西甯的提問並非毫無討論空間，朱文所擔憂的「日本文化」對臺灣「漢文化」的「斷傷」，也或多或少提示了臺灣尚未清理的殖民過去。然而，銀文將王拓的短篇小說〈墳地鐘聲〉定調為「一篇鄉土氣息非常濃厚的作品」後，接著便質疑「王拓寫這篇小說的動機」（*ibid.*: 194）。根據銀正雄的判斷，〈墳地鐘聲〉的「背景是基隆市的小漁村，小說語言用的有土色土香的閩南語（臺灣話），刻畫的人物除了不負責任的教育工作者，泰半都是拙樸而又鄙俗的討海人，如此我們應該可以把它列為『鄉土文學』的作品而無疑問」；他批評這樣的「鄉土文學作品」沒有讓讀者感覺到「作者悲天憫人的胸懷，也不覺得裡面的人物有什麼可愛的地方，更體會不到『鄉土』作品中應有的那份純真精神」（*ibid.*: 200）。銀文批判王拓所描繪的「鄉土」後，進一步點名黃春明與王禎和，評判黃、王二人的小說創作已不再「溫煦甜美」，失去了原有的「鄉土精神」。銀正雄的解讀，恰恰顯示了他如何透過城鄉落差（漁村或農村等鄉下地區）、語言差異（「土色土香」的閩南話）、刻板印象（「拙樸鄙俗」但仍「純真」的鄉下人）定義「鄉土」，而那可說是當時王拓等「鄉土派作家」試圖打破的。

7 陳映真（2017: 292）於199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討論會上，指銀正雄一文是「從政治上、思想上公開攻擊鄉土文學的第一聲砲火」。

《仙人掌》第2期發行時，文化界已經有些許針對鄉土文學究竟為何的討論。王拓的〈「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並非直接回應銀正雄，但他對鄉土文學的闡釋，開宗明義地否定銀文想像中的「鄉土」：「有許多人是把所謂的『鄉土文學』理解作『鄉村文學』，認為它只是以鄉村社會和鄉村人物為題材，並大量運用閩南語方言的文學。」王拓分析，這樣的誤認將導致「鄉土文學」受限於「鄉村」，而無法擔任「建設我們的民族文學的重任」；再者，過於強調「臺語方言」也可能讓鄉土文學侷限於「偏狹的、分裂的地方主義」；最後，若只著重「鄉村」的物質特色而忽略「歷史和社會發展的客觀事實」，鄉土文學將成爲一種懷舊的「鄉愁文學」（ibid.: 116-117）。王拓同樣以黃春明、王禎和小說中的「鄉村」元素爲例，卻給出截然不同的評價：

〔…〕在取材上是以鄉村爲背景，以鄉村人物的生活爲主要描寫對象，並在方言的運用上顯現圓熟的技巧，但是他們所要表現的，並不止於地方的風俗人情，他們作品的可貴，並不在於這些表面的特徵，而是在於作品中所反映的現實生活中的人的感情和人性反應，他們的悲歡、他們的奮鬥、掙扎和心理的願望，而透過這些作品能使我們對這個社會和人多增加一些了解和關切。（ibid.: 117-118）

換言之，銀正雄致力於辨析出「鄉土」元素如「閩南話」或「鄉下人」，顯示出鄉土小說之於他必須保有某些特色以便被輕易辨識出；王拓則強調鄉土文學中的社會與人，他相信鄉土文學反映出的是「現實生活」，擔任著「建設我們的民族文學的重任」。

由此可見，「鄉土文學」之於王拓，並非僅是一種文類或帶有「鄉土氣息」的作品，而是以特定物質條件爲基礎的文學生產。他解釋，1970年至1972年間臺灣所經歷的政治、經濟、社會變動，廣泛地影響了文化界與思想界，而正是這個脈絡提供「鄉土文學」冒現且產出的條件。根據王拓的敘事，國際上的政治衝擊始於釣魚臺事件，隨之而來的外交挫敗如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尼克森訪北京、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等，都提高了中華民國的民族與社會意識，王拓在此提出回歸現實的「反帝」呼籲：「要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要爭取國際的生存權，首先還是在於自己國內政治和社會的徹底革新！」（ibid.: 105）將眼光放回「國內」土地，可說是當時「回

歸現實」的知識分子們主要的感覺結構。王拓肯定眾多「知識青年」下鄉調查，並主張，這些青年所揭發的「勞工同胞們淒慘的不平的生活現實」，不僅僅是國民黨的經濟策略而導致的「臺灣農村的經濟危機」，也是由美資、日資剝削臺灣勞工且造成環境污染的「殖民主義經濟侵略」事件（ibid.: 107-108）。⁸這樣子的「鄉土觀」除了是因爲「成爲離鄉的知識分子」而重建的個人式「原鄉或『鄉土』」外（謝世宗2019: 245），顯然也受到左翼知識分子包括尉天驄、王曉波、陳映真等人影響（陳光興、林麗雲2017）。⁹

但王拓的「鄉土觀」與左翼知識分子堅持的反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並不完全吻合；他的反帝、民族主義關切，與其說是生發自屢受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侵略的中國近現代歷史，不如說是應對著依附美日資本主義發展的臺灣現實。根據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一文的結論，「鄉土文學」是「根植在臺灣這個現實社會的土地上來反映社會現實、反映人們生活的和心理的願望的文學」，也是對仿效西方、罔顧臺灣現實生活的文學作品的批判；鄉土文學尤其著重描寫「在工商社會裡爲生活而掙扎的各種各樣的人」，王拓因此主張，「鄉土文學」應該正名爲「現實主義文學」（尉天驄1978: 119）。從論戰雙方的對立框架來看，王拓提出「現實主義文學」應是爲了抗衡國民黨及其御用文人所定義的「鄉土文學」，但無論謂之「現實主義」或「鄉土」，他認爲文學作品理當深入描寫臺灣社會，而那是被「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高度影響且侵略的「工商社會」，「西方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冷戰二元價值，更導致臺灣文學二十多年來的蒼白與虛無。事實上，王拓對臺灣文學的回顧，是以文壇左翼前輩郭松棻（筆名羅隆邁）所著的〈談談臺灣的文學〉爲範本，〈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也多處直接援引郭松棻的字詞文句。¹⁰〈談

8 這三個事件爲美商飛歌電子公司（1972年10月，臺北淡水）、日商船井電子公司（1973年4月，臺中潭子加工區）、日商三井金屬礦業公司（1973年5月，臺北金山鄉）。

9 王拓提及王曉波介紹他讀史諾的《西行漫記》，因而對毛澤東「佩服得五體投地」，那也是他「真正開始自覺有左的思想」的時刻（陳光興、林麗雲2017: 12）。

10 陳映真（2017: 319-320）在〈向內戰·冷戰意識形態挑戰：七〇年代臺灣文學論爭在臺灣文藝思潮史上劃時代的意義〉一文中提及王拓的〈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部分抄錄郭松棻的〈談談臺灣的文學〉。在《春雷之

談臺灣的文學」於1974年刊登於香港保釣運動左翼刊物《抖擻》，與王拓一文顯著不同的是，在分析臺灣現實之際，更側重以縱向的歷史發展為解釋憑據。除了說明西方資本主義、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與美國形式主義的文學批評理論，如何造成臺灣文學的「墮落」外，郭松棻也強調「五四反帝國主義的傳統」與「中國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文學思潮」的缺席，所帶給臺灣文學的負面影響（羅隆邁1974: 50）。郭松棻以歷史視角界定「臺灣文學」，開宗明義稱「二十世紀的臺灣文學可以說一直沒有與殖民主義斷絕過關係」（ibid.: 48），但王拓在鄉土文學論戰時，是藉著當前的「反資」要務加以定義「臺灣文學」。換言之，王拓的現實主義文學實踐，旨在如實描繪當時在西方資本主義侵略下所形成的臺灣「工商社會」；透過歷史視角反對美日帝國主義且著重中國民族主義，於他而言或許是較為次要的。

儘管如此，王拓在鄉土文學論戰中與左翼知識分子同一陣線，他們支持「鄉土文學」（或稱「現實主義文學」）的立場也意味著對國民黨的反抗。《仙人掌》鄉土文學專號發行一個月後，葉石濤發表〈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緊接著陳映真分別在6月、7月發表〈鄉土文學的盲點〉（以許南村為筆名）、〈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這些文章皆強調文學與現實處境的關聯，提出遠大於「鄉下」、「鄉村」的鄉土觀。儘管葉、陳兩人對「民族」的解讀略有不同，但在論戰中仍因著較為近似的文學觀與文化政治實踐而同為戰友。¹¹國民黨御用文人彭歌隨即在8月發表〈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余光中的〈狼來了〉一文更引發「抓頭」的恐怖氛圍。所幸，國民黨元老胡秋原及時支援鄉土派作家，以〈談「人性」與「鄉土」之類〉一文介入論戰，鄉土文學論戰中的鄉土派作家才免於遭受迫害（林麗雲2019: 8-9）。

論戰歇止後，處在1970年代末期政治社會動盪中的知識分子與運動人士，持續透過不同管道改善臺灣的社會與政治現實。王拓對臺灣現實的

後：保釣運動三十五週年文獻選輯》之序言〈突破兩岸分斷的構造，開創統一的新時代〉，陳映真（2006: 9-10）也提及此事。

11 關於葉石濤與陳映真在鄉土文學中的比較，以及日後兩人在「臺灣文學」、「臺灣本土文學」等議題上的分歧，詳見蕭阿勤（2005: 97-129）。

關懷，也讓他透過寫作積極參與政治活動。1978年至1979年底，王拓進一步以他的書寫為政治實踐的媒介，展現出結合「黨外」各派勢力的意圖。1978年2月起，王拓訪問十多名黨外知名人士，如余登發、黃順興、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林義雄等，這些訪談集結成冊，以《黨外的聲音》為名出版。王拓（1978: 13-17）在題為〈團結黨內外的一切愛國力量共同奮鬥〉的自序中提到，這些訪談欲呈現出黨外人士的長期努力，因為在國民黨政權戒嚴的脈絡中，黨外人士的努力勢必「遭遇到有計劃的封鎖、歪曲和打擊」，而王拓冀望能提供社會大眾讀者更客觀的政治評述與參考標準。在數篇訪談中，王拓屢屢與政治前輩商榷「黨外人士內鬩」的問題，雖是以提問的方式討論，卻也頗有對當前黨外政治生態不滿的涵意。¹²《黨外的聲音》於同年9月出版，立刻遭到查禁。與此同時，王拓積極與黨外勢力交流合作，並登記參選基隆市國大代表。他的參選不只獲得以黃信介為首的黨外勢力的支持，蘇慶黎、王曉波、陳映真、尉天驄等左翼人士也從旁協助輔選，根據他的回憶，他是「代表整個《夏潮》在選舉，甚至是代表臺灣的左翼在選舉」（陳光興、林麗雲2017: 30）。

王拓遺作《吶喊》卻顯示出他與「臺灣的左翼」之間的落差。與其說王拓「代表臺灣的左翼在選舉」，不如說他策略性地結合各股政治勢力以求取黨外的勝利。雖然王拓稱《吶喊》「出自〔他〕的想像和虛構」，但大多數角色的原型都能被辨認出，如陳宏—王拓、鄭黎明—蘇慶黎、徐海濤—陳鼓應、孫志豪—王曉波、屈中和—尉天驄、石永真—陳映真、黃天來—黃信介、羅智信—許信良等，部分人物更是直接使用原名，如唐文標與黃順興（王拓2019a: 574）。縱使小說中偶有不符史實的敘述，王拓著重描述的事件也確實是實際發生過的歷史，包括鄉土文學論戰、中壢事件、橋頭事件等。王拓本人登記參選基隆市國大代表、投身競選活動一事，更是貫穿《吶喊》的主軸。小說以陳宏為第一人稱，呈現出他從婉拒眾人鼓吹到積極參選的心境轉變，描述他如何藉由《黨外的聲音》與《民衆的眼睛》籌措資金、增加知名度，並詳述陳宏與黨外政治人物及《夏潮》雜誌

12 例如與黃順興的訪談（王拓1978: 64），與黃信介的訪談（*ibid.*: 97-100），與康寧祥的訪談（*ibid.*: 108-109）。

社群建立關係，其中的紀實性之高，顯示出《吶喊》應被視作小說與回憶錄的綜合文體，具有回顧分析王拓自身經驗的參考價值。例如：在小說中，王拓（ibid.: 264）沿用他親自受訪的回顧，假鄭黎明說：「陳宏參選，代表的不是他個人，而是代表我們《夏潮》這個系統，代表臺灣的左翼。」但《吶喊》的敘事安排，則顯露出王拓對「左翼」的曖昧情感。在鄭黎明為陳宏舉辦的募款餐會上，王拓透過陳宏、黃天來、林正義（即林正杰）的對話，呈現出一個迥異於《夏潮》網絡的臺灣左翼認識：

林正義穿了一套合身的淺黑條紋西裝，藍色襯衫配一條黃色領帶，默默地微笑著跟在天來仙旁邊。「大概臺灣左派全都動員了吧？」

「什麼左派？臺灣哪有什麼左派？攏總是自由派民主派啦，哪有什麼左派！」天來仙表情嚴肅地說。

「是啦，臺灣左派早就被國民黨連根拔除了，哪裡還有什麼左派。」我附和地說，「我們都是自由派民主派，天來仙就是大元帥！」（ibid.: 392）

這段對話顯示出陳宏與鄭黎明在理解上的落差，容或也暗示著作者王拓對他當時「代表臺灣左翼」的含糊立場。在鄭黎明的面前，陳宏樂意代表「左翼」，但在必要時候也可以否認「左派」，認黃天來為「大元帥」。這樣的策略與王拓在《黨外的聲音》中的自序一致，毋寧是為聯合黨外各派勢力對抗國民黨；然而，藉由《吶喊》，王拓顯示出「左翼」對陳宏（甚至王拓自身）來說，並非一個必不可少的政治位置，正如陳宏在小說中的多次宣稱：左右統獨與他無關。¹³

同《吶喊》中的敘事，王拓首次競選即因國民黨政府得知美國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而被迫中斷，但是他仍積極投入文化與政治活動，企圖改變臺灣的現實狀況。1979年8月，王拓參與《美麗島》雜誌創刊，名列《美麗島》雜誌社務委員及編輯，並與蘇慶黎（以蘇逸凡為名）共同創辦《春風》雜誌，11月發行第1期。《春風》與《美麗島》在內容與參與人

13 例如：「大家共同的敵人不是國民黨嗎？怎麼還分統分獨分左分右呢？」（王拓2019a: 75）；「反正，我也不搞政治不搞選舉，管他什麼統不統獨不獨，都與我無關，我就寫我的文章就好了！」（ibid.: 160）

員上有所重疊，《春風》也將各地的美麗島服務處當作經銷處，但兩相比較後也暗示著蘇慶黎與王拓異於美麗島人士的抱負。《春風》延續鄉土文學介入現實社會的任務，在發刊詞中強調「關懷社會、參與社會、改革社會」是「我們大家的連帶責任」，並自我期許「永不妥協地站在自由民主的一邊，義不容辭地承擔起自己的一份社會責任，和大家共同努力奮鬥」（《春風》雜誌社1979）。同《春風》，《美麗島》也強調介入臺灣社會及政治的必要，首先指控國民黨停止1978年的選舉，但是「民主不死，選舉萬歲！」，自述受到「人民大眾高昂的參政意願和熱情的鼓舞」因而創辦雜誌（黃信介1979）。若前者的關鍵字是「社會」，後者可說是「選舉」。《美麗島》的目標是「新生代政治運動」、讓「民主永遠成為我們的政治制度」（ibid.），而《春風》則提到要藉由「文學」、「歷史」等方面，「和社會大眾一起來努力發掘問題、認真探求答案」（《春風》雜誌社1979）。事實上，王拓三十多年後回顧當時的黨外運動指出，《美麗島》「只是想奪權，基本上跟國民黨的腦子沒有什麼不一樣」（陳光興、林麗雲2017: 33）。但若如《吶喊》所揭示的，王拓並不否認「奪權」一派，更會在必要時挪用他們的話語，甚至附和其對「左翼」的否認。

姑且不論當時的黨外大佬對臺灣左翼抱持何種立場，《美麗島》與《春風》同樣集結在黨外運動的旗幟下，而這樣的反國民黨社會動能更預告著「本土」的出場：「臺灣」不只是現實，也將成為典範。《美麗島》與《春風》不約而同地指責當時已喪失統治正當性的國民黨政府，如何透過「神話」、「禁忌」遏止臺灣的政治運動與社會發展。《美麗島》呼籲：「我們必須徹底從禁忌、神話中解脫出來，深入、廣泛地反省、挖掘、思考我們國家社會的種種問題，這有賴於一個新生代政治運動的蓬勃發展。」（黃信介1979）《春風》則相信「真知可以打破一切虛妄的神話和古老的禁忌」，從而「正確地瞭解自己目前處境和歷史歸趨〔…〕不負先民所託，改變當前環境，創造出一個美好的新社會」（《春風》雜誌社1979）。相對於《美麗島》所著重的「新」，《春風》更強調的是「先民」的託付，提示了內在於左翼政治的民族主義式的歷史關切。但在發刊詞的結尾，兩雜誌皆以「臺灣」為號召，將未來寄望於臺灣的「土地」：

讓我們共同來深深挖掘我們自己的土地，期待一個豐收的明天——自由民主的花朵開遍美麗島！（黃信介1979）

春天，是所有生命的旺季；而「春風」預報了春的訊息，也將吹醒沈睡的靈魂，更將吹綠臺灣的大地！（《春風》雜誌社1979）

對「土地」的重視，且強調土地與政治情況、現實社會的連結，可說是鄉土文學論戰中鄉土派作家的努力成果。但是彼時的黨外運動所強調的「土地」，卻透露著不同的指涉：從一個泛稱的、多半是民族主義式的「中國」，位移至「美麗島」、「臺灣的大地」。¹⁴

1979年12月10日，高雄事件（美麗島事件）發生，50多名黨外人士被捕。王拓被判刑入獄6年。1984年，王拓假釋出獄，兩年後以作家及政治犯身分受各方邀請前往美國。

二、從臺灣到美國：「以一個臺灣人的眼睛看著美國社會」

1979年對國民黨政權來說是巨變之年：年底，反國民黨的社會動能持續累積導致高雄事件，過激的執法行為讓黨外運動更加活躍；年初，美國與中華民國正式斷交，少了美國政府的認定與支持，國民黨政權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搖搖欲墜。然而，即便美國否認中華民國作為中國代表，美國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的關係仍然密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不久後，美國總統卡特簽署美國聯邦公法第96-8號，《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於1979年4月10日正式生效（第96屆聯邦國會1979）。缺少「正式外交」的美國與中華民國，透過美國國內法的架構定義美臺關係。《臺灣關係法》明定美國與臺灣如何「繼續維持美國人民與在臺灣人民間

14 正如呂正惠（2018: 52）所言：「七〇年代的『鄉土』蘊含了更大的範圍，它可以意指『中國』，雖然這一『中國』如何界定人人看法不同。八〇年代以後，傾向臺獨的人認為，『鄉土』就是『本土』，也就是『臺灣』，既不必跟『中國』扯上關係，也必須跟中國割斷關係。」蕭阿勤（2005: 109）也提出類似觀點：1979年底美麗島事件的發生以及八〇年代黨外人士的崛起，開始「提倡將臺灣的文學『去中國化』，將日本殖民時期以來臺灣（本省）人的現代文學發展詮釋成一個具有獨特的『本土化』歷史性格與文學特色的傳統，而這個傳統與五四時期以來的中國（民族）文學進展少有或沒有任何關連」。

之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根據法案，維持這樣的特殊關係是爲了「促進美國外交政策」，美國政府不只要保障人民與人民間的交流，更要「表明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及安定符合美國的政治、安全及經濟利益」。換言之，雖然美國政府已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但仍透過國內法維持與臺灣的政商關係，如販售武器予臺灣當局。在全球冷戰尙未結束時，美國一方面正常化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關係，一方面鞏固與臺灣「無正式外交關係」的親密性，持續保住其在東亞地區的戰略布局。因此，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後，兩地之間的交流仍頻繁如以往；與此同時，臺灣島內的黨外運動熱烈發展，伴隨著國際社會的聲援，國民黨政府解除戒嚴已是大勢所趨。在這樣的脈絡下，王拓以政治犯身分受邀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史丹佛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明尼蘇達大學、明州臺灣同鄉會等地演講，實非特例（國際寫作計畫1986）。

戒嚴—冷戰後期，在美國的臺灣同鄉會與滯美臺人爲黨外運動貢獻良多，但促成王拓訪美的主要單位是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IWP）以及當時的計畫主持人聶華苓。暫且不論聶華苓邀請作家之意圖或與美國政府的關係爲何，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及其前身愛荷華作家工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簡稱IWW），在冷戰期間爲美國的文化外交貢獻頗多。¹⁵1949年，聶華苓因國共內戰舉家遷至臺灣，任《自由中國》文藝主編；1960年9月，因《自由中國》雜誌被勒令停刊、雷震等人被捕，聶華苓也遭到蔣政府監視。1963年，聶華苓與巡訪亞洲各國的美國詩人安格爾（Paul Engle）在臺北的美國大使館相遇相戀，受安格爾之邀前往愛荷華作家工作坊。當時的臺灣文壇對「愛荷華」三字並不陌生：余光中早在1959年取得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學位，與聶華苓約莫同時造訪愛荷華作家工作坊的作家，則包括創辦《現代文學》的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等。這一批臺大外文系的年輕作家受到當時臺北美新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Taipei）處長麥加錫（Richard McCarthy）的推薦，獲得獎學金赴愛荷華進修創意寫作。¹⁶麥加錫曾直言，臺北美新處爲了對抗北京外文出版社，「贊助而且

15 詳見班納特（Eric Bennett 2015）專書以及劉羿宏（Yi-hung Liu 2019）博士論文。

16 參見陳若曦（2011: 106）自傳《堅持·無悔：陳若曦七十自述》。陳若曦雖

確實致力於年輕中文作家之作品的大量英文翻譯」，這些翻譯集結成冊出版，並透過商業管道或各地的美新處散發至世界。¹⁷1967年，聶華苓與安格爾共同創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促進各國作家間的文藝交流，此一旨趣也接軌於美國文化外交政策。例如1973年，美國新聞總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委託拍攝關於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的宣傳片《想像力的社群》（*Community of Imagination*），攝製完成後隨即送至各地的美國大使館公開播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現行網頁也直接說明自身在成立之際，即視美國文化外交為它的「核心任務」（core mission），更表明美國國務院是它的長期支持者。

聶華苓因其背景與文化素養，以及對「中國文學」的堅持與情感，尤其致力於邀請華語世界的作家訪問愛荷華。事實上，王拓於1979年即受邀至愛荷華，當時的邀約卻因美中臺關係緊張，不了了之。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月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後，聶華苓同年9月在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舉辦名為「中國周末」（Chinese Weekend）的大型活動，廣邀各地華人作家共襄盛舉。然而，因政治情勢，造成中國作家（蕭乾、畢朔望）自共和國建立後首次訪美、臺灣受邀作家（王拓、痲弦）因國民黨政府限制出境而缺席的景況。¹⁸但是聶華苓的開場致詞仍難掩興奮：

今天我們大夥兒在一起，這是中國文壇一件大喜事。我們這些人，分離了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不論多少年在我們的感覺上，那是一段很長，很長的日子，太長了！〔…〕但是，在目前

然獲得獎學金但並未選擇愛荷華作家工作訪，而是先到曼荷蓮學院（Mount Holyoke College），後轉學至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7 見麥加錫（McCarthy 1998/12/28）於1998年12月28日的受訪稿，原英文段落：“But I think the most notable thing about the time I was there, which was from August of 1958 to July of 1962, was the work that we did with young writers and artists. We sponsored and, indeed, worked upon a large number of English-language translations of the work of younger Chinese writers. We published the work of books of art by the more advanced avant garde Chinese painters and Taiwanese painters in Taiwan. One reason for doing this was competition with the outpouring of work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art work from the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in Peiping. This stuff was designed for distribution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me of it through commercial channels, some of it through USIS posts elsewhere.”

18 高準是唯一一位自臺北前往參加「中國周末」的作家，並且是以「個人名義」為由，而非接到正式邀請。

這一刻，我們在一起。我們從不同的地區，有的千山萬水，從北京，從臺北，從香港，從新加坡，從美國各地，到愛荷華來，僅僅這一點，就說明了，我們還是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我們對整個中華民族的感情；我們對中國文學前途的關切。（國際寫作計畫1979）

聶華苓對「整個中華民族的感情」、「中國文學前途的關切」，暗示的卻是愛荷華城與臺灣島間的落差。「中國周末」在愛荷華城舉辦，「本土／臺灣意識」則在島內逐漸高漲。1979年9月在愛荷華城暢快談論「中國」、「中華民族」的聶華苓，可能尚未掌握當時臺灣島內逐漸登場的「臺灣本土典範」。舉例來說，聶華苓在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糾正安格爾稱高準為「臺灣詩人」（Taiwanese poet）的「錯誤」，她說：

別說「臺灣詩人」。你應該稱〔這些作家是〕「來自臺灣的詩人」，或「來自大陸」。不然聽起來就像兩個不同的國家，但中國人相信臺灣只是一個省。〔海峽〕兩邊都是這麼相信的。
（Peterson 1979/09/20）¹⁹

無論1970年代後期臺灣的作家、知識分子與黨外運動人士如何定義臺灣的行政單位，島內已出現諸多重新思考兩岸現實的呼籲，如《美麗島》與《春風》說的「打破神話與禁忌」。當時的這些呼籲透露出繁複多樣的國家想像或國族劃分，臺灣與大陸間關係的複雜化已是不爭的事實。聶華苓對安格爾的指正，反倒帶著些許「神話」的意味。

「中國周末」7年後，在愛荷華城見到王拓的聶華苓形容她與王拓「一見如故，很談得來」，但身處在臺灣變革中心的王拓與長年定居愛荷華的聶華苓對「中國」、「臺灣」的見解有著顯著不同（向陽2013: 25）。²⁰若聶華苓強調的是大陸與臺灣共享「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學」，王拓顯然更著重臺灣與大陸間的差異。王拓在訪問愛荷華的3個月期間，被安排與3位中國大陸作家包括邵燕祥、烏熱爾圖、鍾阿城，共同講授「現今的國際寫作：中國場」課程，並在題為「世界文學或國族文學？」與「美國印象」的兩場

19 聶華苓原話：“Don’t say ‘the Taiwanese poet.’ Say ‘the poet from Taiwan,’ or ‘from mainland.’ Otherwise it sounds like two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 Chinese believe Taiwan is just a province. On both sides, they believe that.”

20 聶華苓於1986年10月15日寄給詩人向陽的信。引自向陽（2013）。

論壇中發表簡短演講。²¹「美國印象」論壇為期3天，主辦單位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邀請來自不同國家及地區的作家，分享各自的「美國」。其中，王拓談的不只是美國這個國家，更觸及了逐漸蔚為主流的本土「臺灣」認同。論及美國文化與社會、美國與臺灣的差異之前，王拓首先提出他的「臺灣」定義。王拓（1986）說：「我真羨慕我中國兄弟的演講，他們實在太幽默了。我邊聽邊笑，但同時也感到心情沉重。」²²他解釋「沉重」的緣由：

基本上，臺灣文化源自中國大陸。我們在文化上有很多共同點，也共享著許多問題。我想說的，他們（邵燕祥、烏熱爾圖之後）已經說了不少了。

從1895年起，臺灣已與中國分離長達91年。臺灣社會的某些特質跟中國大陸的特質已經稍微不同了。我正以一個臺灣人的眼睛看著美國社會。（*ibid.*）²³

即便王拓在國際寫作班期間總是與中國大陸去的作家在一起且相處融洽（陳光興、林麗雲2017: 35-36），但他更強調的是自己「臺灣人的眼睛」。王拓要說的是，他與他的「中國兄弟」，「已經稍微不同了」。根據王拓，這樣的「不同」來自於臺灣與中國的「分離」，亦即半世紀的日本殖民與41年的國民黨統治。此時的王拓仍然以歷史條件以及「臺灣社會的某些特質」為出發點，未嘗不可說是保有鄉土文學論戰時的現實主

21 演講及課程原題為“World Literature, or National Literature?”（9月25日）、“Images of America”（11月21日）、“International Writing Today: China Session”（10月13日）。文獻資料顯示，王拓的演講稿應該是先以中文寫成，由IWP的助理或愛荷華大學的學生翻譯成英文，王拓再按照翻譯稿以英文發言。（國際寫作計畫1986）

22 王拓演講的逐字稿為英文翻譯，翻譯者署名凱瑟琳·呂（Katherine Lu，音譯）。英文翻譯或許與王拓本意不盡相同，而由於沒有王拓的中文原稿，此處及以下的「再翻譯」成中文，也可能產生意義上的落差。愛荷華大學的館藏文獻中只有王拓演講稿的英文翻譯稿，作者目前也沒有取得王拓當時演講的中文稿。此文獻收於愛荷華大學圖書館特別館藏。原英文翻譯：“I envy my fellow Chinese brothers’ speeches. They are so humorous. On the one hand, I laugh and on the other, I feel heavy-hearted.”

23 原英文翻譯：“Basically speaking, Taiwan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mainland China. We have a lot of similarities in our cultures and we share a lot of common problems too. They (Shao and Wure) have mentioned many things that I wanted to say. / Beginning in 1895, it has been 91 years since Taiwan is separated from China.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ety of Taiwan is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mainland China. I am looking at the American society through the eyes of a Taiwanese.”（王拓1986）

義觀。然而，他在愛荷華城所說的「現實」，則再次顯露出「民族主義中國」至「臺灣／本土」的位移。時值1980年代後半，這個位移似乎正在走入完成式，後者即將置換前者，成為王拓昔日鄉土文學論戰中所說的「現實」，成為他的「眼睛」。

王拓接著描繪他所看見的美國，這樣的「美國印象」暗示他如何繼承且轉化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時他的位置以及思想資源。王拓認為，臺灣社會應向美國學習的重點有三：政治及生活上的自由與民主，因著尊重「個人」而生的簡單的人際關係，為了促進社群福利而組成的志工團體。王拓（1986）簡短描述他接觸到的「志工團體」以及美國志工的作為與態度，並直言「這改變了我對〔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社會自私自利的印象」。²⁴如此正面的評價，顯然不同於王拓在1977年〈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一文中，批判美商在臺灣實行「殖民主義經濟侵略」的反資立場。在演講的後半段，王拓則顯露出他在鄉土文學論戰、《春風》雜誌創刊時，對社會底層的深刻關懷與同情。當他談及他在紐約哈林區所看見的黑人生活時，王拓批判地問：

為什麼美國這麼一個富有的國家，竟容許那樣貧困的生活？〔…〕這是一個倫理的議題。若我們承認讓每個人過上更好的生活是基本人權，那我們該如何解決自由競爭社會所帶來的問題？〔自由競爭中的〕失敗者就該生活在那種貧困中嗎？如果我們相信自由競爭可以讓每個人發揮最大潛能，那我們該怎麼面對如此不公平的倫理狀況？（ibid.）²⁵

王拓的質問，指出美國社會如何憑藉著新自由主義邏輯如「自由競爭」、「個人潛能」等，正當化了資本主義發展所導致的貧富不均。王拓對美國黑人處境的反思與批判，並置於他對「志工團體」的讚賞、對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改觀，究竟是「反資」的提問，是人文主義式的關懷，或兩者皆

24 原英文翻譯：“This changes my impression of this capitalistic society’s selfishness.”

25 原英文翻譯：“How can a rich country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llows such poverty to exist? (...) This is an ethical issue. If we admit that it is the basic human right for everyone to live a better life, how shall we solve the problem resulted from a free competition society where the defeated ones have to live in such poverty? If we believe that free competition can bring out the greatest potential in everyone, how should we face such an unjust ethical situation?”

是？當王拓面對著美國現實，何以一方面藉由他所看見的黑人社群質問美國社會的貧富落差，但另一方面又肯定美國有「一個健康的社會」，甚至認為「美國的基礎非常穩固，不像我此前所相信的，這個國家的一切是由一小群有錢人控制著」？²⁶

王拓面對美國社會時所呈現出的矛盾認識，甚至他在臺灣解嚴後與左翼知識分子的衝突，或許正是來自於他從1970年代起對當下「現實」的高度重視。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王拓強調文學必須反映臺灣社會的現實主義任務，因而批評美資、日資剝削臺灣勞工、造成環境污染；在愛荷華的演講中，王拓則透露出此種現實主義取向中的實用主義色彩。也就是說，若西方資本主義發展能創造「一個健康的社會」，逐步改善美國黑人社群或臺灣社會的生活品質，那麼「反資」於他而言或許也並非必要。同理，在經歷了黨外運動臺灣民族主義的高漲後，王拓對統獨的判斷，或也可說是隨著他所關懷的當前的社會現實而改變。換言之，統獨等政治立場也能因著現實情況策略性地轉換，一如陳宏在《吶喊》中的表述：

臺灣人民可以決定要不要與中國統一，也可以決定要不要獨立，這要看統一或獨立，哪一個對臺灣人民最有利。如果與中國統一，對臺灣人民幸福不利，為什麼要和中國統一？如果臺灣獨立也對臺灣人民的幸福不利，臺灣為什麼要獨立？〔…〕我並不是反對兩岸統一，我也不是主張臺獨，我只是認為，首先要考慮人民的利益和幸福，如此而已。（王拓2019a: 87-88）

但與左翼知識分子頗有來往的王拓也知道，統、獨的選擇並非只是當下的政治表述，而是國共內戰遺留下來、尚待解決的歷史課題。因此，在陳宏的表述後，王拓也描繪了立基在左翼民族主義之上的立場，讓徐海濤（即陳鼓應）指控陳宏是無視中國民族大義的「投機主義者」。然而，王拓顯然不太同意中國民族主義的呼求，或至少沒有共感，他日後的政治走向也展露出他與《吶喊》主角陳宏一致的看法。

在另一結合回憶錄與小說的遺作《呼喚》中，王拓更直白地描述他對

26 原英文翻譯：“This also prov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healthy society. It is very solid in its foundation, unlike what I used to believe, that everything in this country is controlled by a handful of rich men.”

中國民族主義的否定。當林正堂（即王拓本人）、孫志威（即王曉波）、蔡惠德（即陳映真）討論成立「中國統一聯盟」時，林正堂質問孫志威：

你這個中國統一聯盟是誰統誰呢？臺灣統一中國？那已經有國民黨在臺灣喊了幾十年了，而且，那也只是騙人的口號，誰信呀？如果是要中國統一臺灣，那就去請中共的百萬大軍跨海來打吧！〔…〕那時，我一定捲起衣袖跟你的祖國對幹了！（王拓2019b: 332）

王拓這一段看似主張臺獨的表述，也是基於臺灣利益的實用主義評判，他透過林正堂解釋：「有一天，當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起來了，人民生活富裕了；當中國大陸的社會更民主了，更落實法治，更能保障人權了，那時，兩岸統一就水到渠成了。」（*ibid.*: 332-333）對比於林正堂的著眼現實，稱中國大陸為「祖國」的左翼人士，則被王拓假蔡惠德形容是「堅定信仰馬克思主義，堅定信仰毛澤東思想」（*ibid.*: 203）。當王拓描述「認同社會主義祖國」是一種「無怨無悔」的「信仰」，他強化了左翼知識分子們的理想主義，暗示著此「信仰」的不切實際，進而淡化他們的政治動能。接著，王拓更假顏素如（即蘇慶黎）對中國共產黨所發起的政治運動的批判，否定蔡惠德等人的左翼理想主義「信仰」。在王拓的敘事安排下，蔡惠德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相信映照著林正堂（即他自己）對現實臺灣的關切，這一組對照又透過顏素如對中國共產黨的質疑，讓林正堂的實用主義被肯認，蔡惠德的理想主義被否認。即便王拓的回憶與書寫可能因其後見之明，不能全然等同於他當時的看法，但《呼喚》仍在字裡行間透露出作者的價值判斷，或許並非如論者所稱的「完全不做任何的臧否」（陳芳明2020）。當王拓／林正堂／陳宏提倡以臺灣的現實、「臺灣人民幸福」此一實質標準（而非「信仰」）為要統或要獨的依據時，他也更加靠近且認同臺灣本土化運動。

但根據現有資料顯示，王拓在1980年代後期訪美之時，並沒有選定一個確切的統獨立場，縱使在當時的臺灣文壇與文化圈「去中國化」的呼聲已漸成主流。臺灣社會學者蕭阿勤（2005: 109-110）舉葉石濤的《臺灣文學史綱》（1987）與彭瑞金的《臺灣新文學運動40年》（1991）為例，論證臺灣文學的逐步「民族化」以及隨之而奠定、獨立於「中國」的臺灣文學本土典範。換言之，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中的「民族」，在1980年代的

文壇與文化生產中，已逐漸與「臺灣」劃上等號，且在1990年代的臺灣社會取得優勢位置。與此同時，陳映真以反帝、反封建、中國民族主義為主張的臺灣文學與歷史敘事，亦即後來被稱作「統派」的觀點，則逐漸被邊緣化。在這樣的脈絡下訪問美國的王拓，仍未（或拒絕）選擇統獨，美國的臺灣同鄉會尤其質疑他與統派如黃順興、王曉波、胡秋原、陳映真等人的交往。根據王拓回憶，特別是因為他與陳映真的關係，當時他與具有獨派立場的臺灣同鄉會是「針鋒相對」的（陳光興、林麗雲2017: 35）。然而，就在王拓返臺隔年，臺灣本土化運動隨著解嚴如火如荼展開，統獨兩派也隨之更加對立。在文化圈與文壇內，鄉土文學論戰中的「民族文學」號召逐漸式微，「臺灣文學」則在1990年代進一步建制化，成了臺灣戰後高等教育內獨立於「外文系」與「中文系」的文學研究所。²⁷「臺灣文學」不僅與奠基於反帝、反封建、中國民族主義的「統派」文學生產互相抗衡，兩者的地位也因著本土化運動而日漸懸殊。誠如蕭阿勤所說：「文學本土化典範以及與其對抗的典範作為認識臺灣的知識原則，終極而言，背後都可能隱含了國家的政治暴力。」（蕭阿勤2005: 120）

經過黨外運動與臺灣本土化運動，「統派」與「獨派」知識分子逐漸區分敵我陣營，王拓也隨著國家認同的激化而自願或被迫選邊。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時支援彼此的戰友們，自1980年代末起在史觀、政治上的對立逐漸深化，1990年代初期後，國家資源分配的不平均，或許也讓向來以中國民族近現代史觀分析統獨爭議的知識分子們感到不滿且憤怒。陳映真甚至在1990年代後半公開批評王拓的「倒退與反動」。1997年10月，兩場關於鄉土文學論戰的研討會分時分地舉辦：10月19日，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人間出版社、夏潮聯合會在臺灣師範大學合辦「回顧與再思：鄉土文學論戰二十年討論會」；10月24日，在誠品敦南店，文建會、春風文教基金會、《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合辦「青春時代的臺灣：鄉土文學論戰二十

27 真理大學首先於1995年提出成立「臺灣文學系」的構想，教育部於1997年核准，成功大學也於1998年向教育部申請設立「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2000年代上半，臺灣文學的教研機構在高等教育界遍地開花，除了真理大學與成功大學，清華大學（2002）、政治大學（2003）、中興大學（2004）、臺灣大學（2004）等，皆參與了臺灣文學的建制化過程。

周年回顧研討會」。兩場會議只間隔一星期，但清楚標示著回顧「鄉土文學論戰」的兩種視角，以及詮釋「臺灣文學」的兩種歷史敘事。研討會結束後，陳映真撰寫了〈一時代思想的倒退與反動〉，嚴詞批評王拓：

〔…〕對自己在七〇年代他自己和整個鄉土派的反帝（中華）民族主義進行抹殺和否定〔…〕把鄉土文學運動同七〇年代末臺灣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硬生生地聯繫起來，從而在八〇年代逐步臺獨化的這一民主化運動掙得一張共乘的車票，為他自己的政治轉向取得歷史的正當性。（石家駒2017: 380）

對陳映真來說，王拓的「現實主義迫力」已經不復存在，²⁸他更進一步判斷：「王拓不是自來臺獨。事實是王拓後來在思想上倒退、反動了。」

（石家駒2017: 380）但王拓面對陳映真的批評，更多的是不解：

我一直不理解為什麼鄉土文學論戰二十周年回顧的時候他（陳映真）對我是那種對立的態度，他竟然會說：「鄉土文學論戰的解釋權不能夠讓臺獨獨占。」用這個作理由針對我去辦二十周年活動。這對我感情上傷害很大〔…〕可能我沒有自認為是臺獨，人家早就把我定性為臺獨了，可是就算是臺獨也可以是朋友〔…〕。（陳光興、林麗雲2017: 51）

在自認或被定性為臺獨或統派的情況下，昔日戰友只能兩相失望。王拓的不解與陳映真的憤怒以及兩人關係的轉變，顯示出知識分子間的私人網絡及情感，如何因著對「國家」的各式想像被動搖；鄉土文學論戰及其後續中持續激烈化的統獨對立，則暗示著因國共內戰以及1979年「中」美關係生變後，「兩個中國」爭議的懸而未決。

外在於「兩個中國」的愛荷華，雖未近身參與臺灣文壇及社會發展的關鍵時刻，如外交挫敗、鄉土文學論戰、黨外運動等，但或許正是這樣的距離，愛荷華卻能為臺灣島內的統獨爭議提供一個註釋。王拓的愛荷華經驗再次顯示出他著眼臺灣現實的深刻關切，而陳映真的愛荷華經驗則解釋了他堅持中國民族主義的原因。陳映真早王拓三年，也成了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的駐城作家。²⁹身在1983年愛荷華城的陳映真，不似王拓強調臺灣，

28 陳映真署名許南村（2017: 342）〈試評《金水燭》〉，原文初刊於1976年。原段落：「他的文學並不漂亮，並不豐潤富泰，像漁村中一張滿是風霜的臉龐，給予你某種索漠而強烈的現實主義迫力。」

29 事實上，陳映真早在1968年就受邀至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但因民主臺灣聯盟

反而主張自己身為「中國作家」的認同，並且將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挪用成他與中國大陸作家互動的平臺。陳映真（1984: 101）認為：「做為一個中國的作家，去會見同為中國作家同事的大陸作家，在以海峽為界相對峙、相隔絕的現實情況下，有嚴肅而且重大的意義。」陳映真與王拓各自的愛荷華經驗暗示著兩人的分歧或許早已開始，而黨外運動激進化、臺灣民族主義高漲、本土化運動熱烈展開，只是讓他們的分歧愈加擴大，兩人也分別被定性為「統」或「獨」。

然而，也正是他們的愛荷華經驗，揭露了統獨標籤的局限與武斷：陳映真表現出的與其說是大中國民族主義，更是為了兩岸和平而跨越海峽屏障、理解對方的努力，王拓對臺灣的強調與其說是支持臺灣獨立的臺灣民族主義，或可說是他一以貫之緊扣著臺灣土地現實的「鄉土觀」，正如他在臺獨派面前為陳映真的辯護：「你們認為對臺灣的貢獻比陳映真更大的，可以站出來，如果沒有的話你沒資格講陳映真。」（陳光興、林麗雲2017: 35）

三、結論

在臺灣，本土化運動自1980年代起逐步發展，1987年解嚴後達至高峰；在愛荷華，中國周末風光結束後，聶華苓自1980年起陸續邀請後來多被論者歸為本土派或甚至臺獨派的作家，如吳晟（1980）、宋澤萊（1982）、楊青矗（1985），以及王拓（1986）。縱使比臺灣晚了幾年，從「中國」往「臺灣」的位移也在愛荷華城發生：1986年前，聶華苓所說的「來自臺灣的中國作家」在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年度報告中皆是以「臺灣，中國」（“Taiwan, China”）標示來自何方，但是在王拓那一年，不知確切原因為何，這個標誌只剩下「臺灣」（“Taiwan”）。儘管如此，王拓的矛盾與政治立場，似乎也不能單單藉著「臺灣」這個標誌說明白。

本文藉著王拓從鄉土文學到黨外運動的投資生產，以及從臺灣至美國

的軌跡，試圖描繪王拓與當時代知識分子、運動人士如何回應島內戒嚴與國際情勢，以及他們之間的互動與合作，糾纏與分裂。除了描繪出王拓在鄉土文學論戰與黨外運動中的貢獻，如何關聯著臺灣1970年代後期的文化與政治發展，本文進一步透過王拓1986年的美國行，尤其是他在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時的論述，提供一個大於臺灣的框架予現行的王拓與臺灣鄉土文學研究，以及廣義的臺灣文學研究。王拓的「鄉土觀」與政治立場看似幾經轉折，從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中立基在左翼思想的「現實文學」，至1979年隨著黨外運動蓬勃發展的「臺灣本土」，再到愛荷華以「臺灣人的眼睛」評判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在在暗示他不願或無力選擇一個清晰的立場。1980年代後期，本土化運動全速發展，國家認同也日漸激化，與此同時，王拓與昔日的《夏潮》戰友漸行漸遠，加入民主進步黨並參選基隆市長，此後，他的名字總與以臺灣民族主義為基底的「臺獨」標籤相連。

然而，王拓對涇渭分明的統獨標籤感到不解，正因為自1970年代起，他對臺灣現實的深刻關切即讓他的統獨政治帶有實用主義的意味。他的政治選擇與立場往往是策略性的，例如《吶喊》中的描述：王拓能「代表臺灣左翼」參選，但也能視情況否定左翼。王拓的矛盾，顯示出此刻彷彿已具備既定意義的「統」「獨」標籤，在不同脈絡中的任意（arbitrariness）與多義。

臺灣身處在國共內戰中且屬美國陣營的前線島嶼，文化場域及政治發展正是在矛盾與多義中成形。即便今日的「臺灣／本土」認同幾乎已是不證自明，「統獨爭議」也似乎已是過於陳舊的議題，但這些涉及文化、政治、族群、國家的問題，在1970年代至1990年代間確實曾喧囂一時，而喧囂之內的細節則尚有待我們的回看與釐清。認同的形成不只得力於知識分子間的論辯，也取決於國家資源的挹注，認同建立後，知識分子們的複雜網絡情誼似乎也因著內戰與冷戰一分為二，那或許是認同政治的代價。

airiti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王拓 (Wang, Tuo)。1978。《黨外的聲音》*Dangwai de shengyin [Voices Outside the Party]*。臺北 (Taipei)：長橋出版社 (Changqiao chubanshe)。
- 。2019a。《吶喊》*Nahan [Outcry]*。臺北 (Taipei)：印刻出版社 (Ink Publishing)。
- 。2019b。《呼喚》*Huhuan [Calling]*。臺北 (Taipei)：印刻出版社 (Ink Publishing)。
- 王拓 (Wang, Tuo) 著、凱瑟琳·呂 (Katherine Lu) 譯。1986。《美國印象》*Meiguo yinxiang [Images of America]*。愛荷華大學圖書館特別館藏 Aihuehua daxue tushuguan tebie guancang [Special Collections, The University of Iowa Libraries]，保羅安格爾文獻第40箱 Baoluo angeer wenxian di 40 xiang [Paul Engle Papers Box 40]。於2017年8月14日提取文獻。
- 王健壯 (Wang, Jianzhuang)。2009。〈沒有人間，哪來鄉土〉“Meiyou renjian, nalai xiangtu” [Without renjian, there's no xiangtu]，〈《紙上風雲 高信疆》*Zhishang fengyun Gao Xinjiang [Wind and Clouds on Papers, Gao Xinjiang]*，季季 (Ji Ji)、郝明義 (Hao Ming-Yi)、楊澤 (Yang Ze)、駱紳 (Luo Shen) 主編，頁66-69。臺北 (Taipei)：大塊文化 (Locus Publishing)。
- 石家駒 (陳映真) (Shi Jiaju [Chen, Yingzhen])。2017 (1997)。〈一時代思想的倒退與反動〉“Yi shidai sixiang de daotui yu fandong” [Regression and Reaction of an Epochal Thought]，〈《陳映真全集16》*Chen Yingzhen quanji 16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Chen Yingzhen 16]*，宋玉雯 (Sung Yu-Wen) 主編，頁362-395。臺北 (Taipei)：人間出版社 (Renjian)。
- 向陽 (Xiang, Yang)。2013。〈慈悲喜捨的樹：聶華苓與IWP〉“Cibei xishe de shu: Nie Hualing yu IWP” [A Tree of Kindness, Compassion, Joy, and Giving: Nie Hualing and the IWP]，〈《寫字年代：臺灣作家手稿故事》*Xiezi niandai: Taiwan zuojia shougao gushi [An Era of Writing: Stories about Taiwanese Writers' Manuscript]*，頁20-27。臺北 (Taipei)：九歌 (Chiuko)。
- 呂正惠 (Lu, Zhenghui)。2018 (2012)。〈鄉土文學與臺灣現代文學〉“Xiangtu wenxue yu Taiwan xiandai wenxue” [Home-soil Literature and Taiwan's Modern Literature]，〈《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Huiwang xianshi, ningshi renjian: xiangtu wenxue lunzhan sishinian xuanji [Gaze Back at Reality, Gazing at the World: An Anthology of Forty*

Years of Controversy in Home Soil Literature], 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 (Wang Chih-Ming, Lin Li-Yun, Xu Xiu-Hui and Im Woo-Kyung) 編, 頁236-255。臺北 (Taipei): 聯合文學 (Unitas Publisher)。

李進益 (Li, Jing-Yi) 編。2017。《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100: 王拓》*Taiwan xiandangdai zuojia yanjiu ziliao huibian 100: Wang Tuo* [Compilation of Contemporary Writers in Taiwan 100: Wang Tuo]。臺南 (Tainan): 國立臺灣文學館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林麗雲 (Lin, Li-Yun)。2019。〈序言〉“Xu yan” [Preface], 《回望現實, 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Huiwang xianshi, ningshi renjian: xiangtu wenxue lunzhan sishi nian xuanji* [Gaze Back at Reality, Gazing at the World: An Anthology of Forty Years of Controversy in Home Soil Literature], 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 (Wang Chih-Ming, Lin Li-Yun, Xu Xiu-Hui and Im Woo-Kyung) 編, 頁4-25。臺北 (Taipei): 聯合文學 (Unitas Publisher)。

《春風》雜誌社 (Spring Breeze Press)。1979。〈發刊詞〉“Fakan-ci” [Statement of Purpose]。《春風》*Chunfeng* [Spring Breeze] vol.1, no.1: 1。

第96屆聯邦國會 (96th Congress)。1979。《臺灣關係法》*Taiwan guanxifa* [Taiwan Relations Act], 美國聯邦公法第96-8號 Meiguo lianbanggongfa di 96-8 hao [Public Law 96-8 96th Congress]。Retrieved from: <https://www.ait.org.tw/our-relationship/policy-history/key-u-s-foreign-policy-documents-region/taiwan-relations-act/> on Aug 20, 2019.

尉天驄 (Yu, Tien-Tsung) 主編。1978。《鄉土文學討論集》*Xiangtu wenxue taolunji* [Collected Essays of Home-Soil Literature]。臺北 (Taipei): 遠流 (Yuan-liou Publishing)。

陳光興 (Chen, Kuan-Hsing)、林麗雲 (Lin Li-Yun) 主訪, 郭佳 (Guo Jia)、劉雅芳 (Liu Ya-Fang) 整理。2017。〈出身八斗子的「土左」: 王拓訪談〉“Chu shen Badouzi de ‘tuzuo’: Wang Tuo fangtan” [A “Tuzuo” from Badouzi: Interview with Wang Tuo], 《人間思想15》*Renjian sixiang 15* [Renjian Thought Review 15], 陳光興 (Chen Kuan-Hsing) 等主編, 頁5-56。臺北 (Taipei): 人間出版社 (Renjian)。

陳芳明 (Chen, Fang-Ming)。2020/04/11。〈王拓文學未完〉“Wang Tuo wenxue weiwan” [Wang Tuo’s Unfinished Literature], 《聯合報》*Lianhe bao* [United Daily News]。Retrieved from: <https://udn.com/news/story/12661/4480155> on Jun 20, 2020.

許南村 (陳映真) (Xu Nancun [Chen, Yingzhen])。2017 (1976)。〈試評《金水孀》〉“Shiping ‘jinshuishen’” [Review on ‘Aunty Jinshui’], 《陳映真全集2》*Chen Yingzhen quanji 2*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Chen Yingzhen

- 2]，宋玉雯（Sung Yu-Wen）主編，頁329-344。臺北（Taipei）：人間出版社（Renjian）。
- 陳映真（Chen Yingzhen）。1984。〈想起王安憶〉“Xiangqi Wang Anyi” [Thinking of Wang Anyi]，《文季》*Wenji* [Seasons of Literature] 2(3): 101-103。
- 。2006。〈前言二：突破兩岸分斷的構造，開創統一的新時代〉“Qianyan er: tupo liangan fenduan de gouzao, kaichuang tongyi de xinshidai” [Preface 2: Breaking Through the Cross-Strait Division System, Initiating a New Era of Unification]，〈春雷之後：保釣運動三十五週年文獻選輯〉*Chunlei zhibou: baodiao yundong sanshiwu zhounian wenxian xuanji* [After Spring Thunder: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Baodiao Movement at the 35th Anniversary]，龔忠武（Gong Zhongwu）等主編，頁4-14。臺北（Taipei）：人間出版社（Renjian）。
- 。2017（1997）。〈向內戰·冷戰意識形態挑戰：七〇年代臺灣文學論爭在臺灣文藝思潮史上劃時代的意義〉“Xiang neizhan lengzhan yishixingtai tiaozhan: qiling niandai taiwan wenxue lunzheng zai taiwan wenyi sichaoshi shang huashidai de yiyi” [Challenging the Civil War-Cold War Ideology: The Epochal Meaning of the 1970s Literary Debates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Art]，〈陳映真全集16〉*Chen Yingzhen quanji 16*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Chen Yingzhen 16]，宋玉雯（Sung Yu-Wen）主編，頁292-346。臺北（Taipei）：人間出版社（Renjian）。
- 陳若曦（Chen, Ruoxi）。2011。《堅持·無悔：陳若曦七十自述》*Jianchi, wuhui: Chen Ruoxi qishi zishu* [Persistent, Regretless: Self-Narrative of Chen Ruoxi at Seventy]。臺北（Taipei）：九歌（Chiuko）。
- 國際寫作計畫（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1979。《中國周末會議記錄》*Zhongguo zhoumo huiyi jilu* [The Chinese Weekend 1979]。愛荷華大學圖書館特別館藏 Aihetia daxue tushuguan tiebie guancang [Special Collections, The University of Iowa Libraries]，保羅安格爾文獻第25箱 Baoluo angeer wenxian di 25 xiang [Paul Engle Papers Box 25]。於2017年8月15日存取文獻。
- 。1986。《年度報告》*Niandu baogao* [The IWP 1986 Annual Report]。愛荷華大學圖書館特別館藏 Aihetia daxue tushuguan tiebie guancang [Special Collections, The University of Iowa Libraries]，保羅安格爾文獻第22箱 Baoluo angeer wenxian di 22 xiang [Paul Engle Papers Box 22]。於2017年8月11日提取文獻。
- 傅月庵（Fu, Yue-An）。2003。《蠹魚頭的舊書店地圖》*Duyutou de jiushudian ditu* [The Silverfish head's Second-hand Bookstore Map]。臺北（Taipei）：遠流（Yuan-liou Publishing）。

- 黃信介 (Huang, Hsin-Chieh) 。1979。〈發刊詞〉“Fakanci” [Statement of Purpose]。《美麗島》 *Melidao [Formosa]* vol.1, no.1: 1。
- 蕭阿勤 (Hsiao A-Chin) 。2005。〈臺灣文學的本土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權力〉“Taiwan wenxue de bentu dianfan: lishi xushi celyue de benzhi zhuyi yu guojia quanli” [“Indigenization” (bentuhua)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Historical Narrative, Strategic Essentialism and State Power]，〈文化研究〉 *Wenhua yanjiu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 97-129。
- 。2010。《回歸現實：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 *Huigui xianshi: Taiwan yijiuginiandai de zhanhoushidai yu wenhua zhengzhi bianqian [Return to Reality: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1970s Taiwan and the Postwar Generation]*，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 謝世宗 (Shie, Shr-Tzung) 。2019。《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 *Jieji youguan: guozu lunshu, xingbie zhengzhi yu zibenzhuyi de wenxue zaixian [Class That Matters: Colonial Economy, Empire Culture and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of Taiwanese Nativist Literature]*。臺北 (Taipei)：群學 (Socio Publishing)。
- 羅隆邁 (郭松棻) (Luo Longmai [Gui, Songfen]) 。1974。〈談談臺灣的文學〉“Tantan taiwan de wenxue” [To Talk about Taiwan’s Literature]。《抖擻》 *Dousou [Duosou]* 1: 48-56。

二、外文書目

- Bennett, Eric. 2015. *Workshops of Empire: Stegner, Engle, and American Creative Writing During the Cold War*.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 Liu, Yi-hung. 2019. *Cold War in the Heartland: Transpacific Exchange and the Iowa Literary Programs*. Ph.D. Dissert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oa.
- McCarthy, Richard M. Interview by Jack O'Brien. 1998/12/28. “Richard M. McCarthy” (Foreign Affairs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Association for Diplomatic Studies and Training). Arlington, VA. Retrieved from: <http://www.adst.org/OH%20TOCs/McCarthy,%20Richard%20M.toc.pdf> on Sep 20, 2017.
- Peterson, Iver. 1979/09/20. “Iowa Literati Narrow China-Taiwan Gap,” *The New York Times*.